

聚焦区域发展

全国政协委员郑亚莉：

从“单兵作战”到“抱团发展”

本报记者 李元丽

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是新时代国家重大战略之一。全国政协委员、浙江财经大学副校长郑亚莉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浙江省开化县依托三省交界的区位优势，联合周边浙江省淳安县、常山县，江西省玉山县、德兴市、婺源县，安徽省休宁县签订发展共识，构建形成“浙皖赣三省七县（市）协作区”，致力打造环国家公园重点生态功能区、开放开发先行区、产业协同示范区、文化交融展示区、联防联控样板区五大标志性成果，实现从“单兵作战”变“抱团发展”。

郑亚莉表示，从长三角一体化向西拓拓来看，浙皖赣三省边际区域协作区作为离长三角一体化区域

最近的省际合作区块，积极融入长三角一体化战略中，承接外溢的产业经济，同时由东部往中部安徽省、江西省出发先行探路，聚力打造全国山区县区域协作样本实践。而浙皖闽赣四省九方经济协作区成立于1986年，是我国最早建立的跨省域经济合作组织之一，由浙江、福建、江西、安徽四省毗邻的九市（衢州、丽水、金华、南平、上饶、抚州、景德镇、鹰潭、黄山）共同组成。九方经济区自成立以来，对推动各成员市的经济社会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目前，已成为全方位协作推动区域一体化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平台，对打造“浙皖赣三省七县（市）协作区”具有

重要支撑作用。此外，“浙皖赣三省七县（市）协作区”内的7个县（市）区位相近、资源相似、人文相通、发展相融，已经在产业发展、社会治理、生态保护、青年交流等多个领域开展了深度合作，有效推动了区域协调发展，各县（市）经济社会发展均取得了一定成效，浙皖赣三省七县（市）协作区的建设得到大家一致认可。

缺乏上级政策推动，导致各县有合作意愿但难以推动决策落地；缺乏顶层设计指导，导致各县有合作诉求但难以协同有效推进，极易出现“眉毛胡子一把抓”的现象……这是郑亚莉在调研中发现的问题所在。

为此，郑亚莉建议：将“浙皖赣

三省七县（市）协作区”列入全国省际交界地区协调发展试验区，统筹浙江省、安徽省、江西省，联合制定三省七县（市）区域合作协调机制、实施意见等区域发展指导性文件，形成省级区域协作领导小组、县级联席会议制度等常态机制。同时将浙皖赣三省七县（市）协作区区域合作作为重要课题，借助智库平台，集合力量、集聚资源、集成政策，对协作区域合作顶层设计《浙皖赣三省七县（市）协作区合作规划》出谋划策和定期指导，同时加快形成课题研究成果，向全国推广浙皖赣三省七县（市）协作区新模式、新路径。

全国政协委员钟瑛：

加快西部欠发达民族地区中国式现代化进程

本报记者 李元丽

当前我国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发展阶段，民族地区现代化发展对推动全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具有重要意义，促进西部欠发达民族地区的快速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内容与目标。

在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研究员钟瑛看来，西部欠发达民族地区现代化进程中存在很多的共性问题。如，区域发展目标与发展手段不匹配。西部欠发达民族地区强烈的发展意愿与相对落后的发展现状之间的矛盾，导致追求快大的发展思维陈旧，各地有加快经济增长的冲动与要求，但区域内的发展条件往往难以支撑主观的发展愿望。在当前大趋势下，单纯地依靠经济增长、靠项目拉动，并不符合经济发展规律，经济增长与居民收入增长之间的矛盾势必非常突出。如区域定位错位。西部欠发达民族地区丰富的资源禀赋与低下的资源开发能力之间的矛盾，导致粗放的发展模式依旧。很多西部欠发达民族地区有着丰富的自然资源，但自然资源开发的时空条件却相当滞后。“资源输出”的区域定位和狭小的产业发展空间结合在一起，经济增长依靠资源开发的思维禁锢，造成一些地区千方百计

将西部欠发达民族地区走内生式发展道路这一战略的关键保障和重要手段，以法律的形式确定下来，这也是当前政府在政策方面需要做出的最大调整。

用资源换增收、换经济总量的增长，无法持续对西部欠发达民族地区的社会建设、居民福利起到直接作用。如区域帮扶制度边际效应递减。长期以来，随着西部大开发的深入，国家对西部欠发达民族地区的支持持续不断加大。但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国家对西部欠发达民族地区的制度性倾斜所应当起到的效果正在被弱化，例如，在财政转移支付日渐增加的同时，通过市场化机制输出的资金总量也在快速增长；在通过民生工程的实施极大地改善了西部欠发达民族地区教育、卫生等基础设施建设水平的同时，教育、卫生所需要的人才却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源源不断地离开西部欠发达民族地区。

那么，如何加快西部欠发达民族地区现代化进程？钟瑛表示，需摒弃长期以来以环境资源去替代较为稀缺的经济资源和社会资源的主要模式。唯有彻底放弃这种发展模式，才能杜绝资源匮乏之忧和资源价值分配之争。通过强化西部欠发达民族地区发展的硬性环境资源约

束，将其落到实处，以形成足够的倒逼压力，激发区域内创新活动，催生并激发一个社会资源和经济资源的培育与发展过程，进而形成源源不断的区域发展的内在动力，为西部欠发达民族地区这一生态环境脆弱地区培育新的社会、经济和文化核心资源。

为此，钟瑛建议：一是强化民生为先并形成更为公平的民生政策。西部欠发达民族地区在民生问题上相较于其他地区，无论是问题的聚焦点还是解决的难度，都有着较大的差异。因此，应以居民的福利提高而非收入作为民生的重要衡量标准，福利提高应当在西部欠发达民族地区民生问题的判断和衡量上居于核心位置。不能仅仅以收入作为判断的标准，这一指标不足以反映这些地区民生问题的特殊性，也不足以反映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市场的负面效应在这些地区的集中程度。将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在西部欠发达民族地区具有更高的必要性和更强的紧迫性。

二是必须遵循现代化发展规律推动区域内生式发展。第一，要提高西部欠发达民族地区区域发展的特色化水平，以特色化的发展来增

强发展的独立性与市场竞争力。第二，提高西部欠发达民族地区经济的市场化运行水平，以深度的市场化来密切西部欠发达民族地区与全国统一市场的联系，建立起多层次、多元化的市场联系，取代当前计划色彩浓厚的外部要素注入机制，逐步取代当前依附加值的区域内资源向外输出机制。第三，将西部欠发达民族地区走内生式发展道路这一战略的关键保障和重要手段，以法律的形式确定下来，这也是当前政府在政策方面需要做出的最大调整。

三是正视和积极回应各族群众的不同民生需求。在战略层面上应进一步明确西部欠发达民族地区居民实现自我发展所面临的特殊自然、历史、文化和经济条件，通过民生政策的制订和民生工程的持续性推进，满足各族群众最紧要、最急迫的现实需要。改变长期以来以积累形成的经济发展与社会需求不匹配、社会发展与群众诉求不对接、发展战略侧重于经济领域的状况。正视各族群众的不同民生需求，既要保障最为基本的民生需求，还要重视促进群众实现自我发展的需求，更为重要的是不能排斥群众因传统文化与社会因素所形成的特殊的价值追求。以民生需求的政策化，来提高民生工程的针对性，促进西部欠发达民族地区加快形成社会、经济、生态系统协同演进的现代化发展进程。

抓住新质生产力的智能化趋势

冯宗邦

新质生产力是代表新技术、创造新价值、适应新产业、重塑新动能的新型生产力。智能化作为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驱动力量，已经成为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的重要引擎。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新质生产力是创新起主导作用，摆脱传统经济增长方式、生产力发展路径，具有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特征，符合新发展理念的先生产业力质态。

如果说传统生产力是人类已经掌握并正在使用的生产力，那么新质生产力就是以云计算、互联网、大数据、区块链及人工智能等工具体系为代表的生产力新系统。新质生产力在各行各业中都有着广泛的应用前景和应用，智能化发展无疑是最令人瞩目的方向，特别是随着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智能化技术的快速发展，正在深刻改变着新质生产力的面貌。

一是智能化催生新制造发展。新制造涉及新能源、新材料、新医药、新制造装备和新材料等领域，智能化为这些行业发展提供了数据驱动的智能决策、智能生产、智能物流和产品创新等。在智能决策中，通过大数据分析和机器学习算法，对大量数据实时监测和分析，帮助制造企业更好地预测市场需求、优化生产计划、提高生产效率。在智能生产中，通过机器视觉和机器人技术，自动检测零部件和装备，实现生产过程的智能调控，提高生产线的灵活性、适应性。

二是智能化催生新服务发展。新服务业体系涵盖数智化服务业、科技创新驱动的服务业、与实体经济融合的服务业、普惠共享服务业等方面。智能化服务业包括通过数字化、网络化转型的各类科技自立自强与开放式创新；科技创新驱动的服务业主要包括生物技术服务、新能源服务、环境技术服务、AI和机器学习服务等；与实体经济融合的服务业主要指与农业、制造业等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的服务业；普惠共享服务主要指向普及性和基础性的服务业，包括社区便民服务、基本医疗保障服务、教育服务、公共交通等。

三是智能化催生新业态发展。新业态是指随着科技进步、经济发展和业态变迁而出现的新型产业形态和社会模式。目前，常见的新业态主要包括共享出行和共享住宿的共享经济，以及互联网平台商业模式在线市场、社交媒体、服务聚合等平台经济。随着技术进步和社会发展，未来还将出现更多新兴

态和模式。

新质生产力的培育和发展，需要智能化技术引发的生产力跃升，不断完善发展环境，加强创新能力，提升智能化发展水平，进一步释放新质生产力潜能，推动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

加快积累与优化数据要素。一是加快完善数据要素市场。推进数据确权，出台数据确权方面的制度办法，厘清国家与地方之间、政府部门之间、政府与个人之间的数据权属边界，明确政府对企业和个人数据的权利范围、利益返还机制。二是加强数据保护措施，完善个人信息保护法律法规体系，确保数字要素市场的健康发展。三是培育新型数字经济劳动者队伍。加强产教融合，促进数字人才培养与产业需求之间的有效衔接，构建基于企业实际需求的数字化人才培养方案，促进数字经济核心企业联合高校院所、高层次人才进行专项性基础研究和关键性技术攻关，持续开辟出一条数字化人才培养之路。四是加快数字劳动资料迭代升级。加强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等数字技术融合应用，大力推广应用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生产工具，加快建设数字化车间和智能制造示范工厂。

加快数字技术创新与应用。一是加快数字技术基础设施建设。进一步加快5G、光纤宽带、工业互联网、数据中心等为代表的数字信息基础设施建设，促进东西部算力高效互补和协同联动，引导通用超算中心、智能计算中心、边缘数据中心等合理梯次布局，整体提升应用基础设施水平，加强传统基础设施数字化、智能化改造。二是加快数字技术创新成果的突破、转化和扩散。面向前沿数字技术，加强基础研究，重视原始创新，积极培育新一代信息技术。三是正确处理科技自立自强与开放式创新、知识产权保护与技术标准化、技术创新与技术扩散等关系，为发展新质生产力构筑具有全球竞争力的数字技术创新生态系统。

加快数实融合发展。一是培育壮大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在人工智能、大数据、电子信息等领域打造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数字产业集群。二是加快促进产业数字化。以智能制造、智能家居、数字安防等产业为代表，利用数字技术促进产业链上下游的全要素数字化升级、转型和再造。三是推动现有业态和数字业态跨界融合。探索跨界融合过程中出现的生产消费新环节、新链条、新模式，加快发展智慧零售、智慧交通、智慧家居、智慧教育等新业态，促进新质生产力新业态发展，更好满足和创造新需求。

追求真实 不走捷径

本报记者 张磊

近日，记者采访了一位从事互联网科技的全国政协委员，他的一句话深深触动了我：发展科技是为了追求真实的结果，不能走捷径。是的，不但发展科技要追求真实的结果，不能总想着走捷径，在其他领域同样如此。

在科技日新月异的今天，我们似乎总是被各种新发明、新技术所包围，它们不断地改变着我们的生活，推动着社会的进步。然而，在这股科技热潮中，我们是否应停下来思考：发展科技的初衷是什么？

人类发展科技的初衷，是为了更好地理解世界、解决问题，进而改善生活。无论是物理学的发现，还是医学的进步，都源于人类对真实结果的追求。科技的本质在于探索、实验和验证，它要求我们以严谨的态度去揭示自然的奥秘，以务实的精神去应对生活中的挑战。因此，真实结果是科技发展的基石，也是衡量科技价值的标准。

然而，在追求真实的过程中，却常常面临着走捷径的诱惑。无论是个人成长还是社会发展，捷径似乎总是更加诱人。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走捷径往往意味着放弃对真实的追求，选择一种简单、快速但不准确的方式，虽然在短期内可能带来一些好处，但长远来看，却可能导致我们失去对事物本质的理解，甚至走向误区。

对于个人而言，走捷径可能意味着放弃自我成长的机会，选择一种轻松但缺乏挑战的生活方式。这样的生

活虽然安逸，但却缺乏深度和广度，无法让我们真正体验到人生的精彩和价值。因此，我们应该拒绝走捷径，坚持追求真实和成长，不断提升自己的能力和素质。

对于社会而言，同样如此。一个健康、和谐的社会需要建立在真实的基础之上，一味走捷径可能意味着忽视问题的本质，选择一种表面化、功利化的解决方案。这样的解决方案虽然能够暂时缓解问题，但却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甚至可能引发更多的问题。因此，我们应该以追求真实为基础，深入分析问题的本质，寻找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推动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当前，在科技浪潮下，各国都在竞相发展科技创新，以谋求经济、社会和文化的全面进步。然而，这种竞争不应仅仅局限于表面的速度和规模，更应注重科技创新的质量和深度。一个国家要想在科技领域取得长足发展，就必须坚持真实的原则，注重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不断培养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加大对创新型人才的培养和引进力度，努力形成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和产品。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实现科技强国的梦想。

总之，发展科技对人类的意义在于探索与突破，追求真实与成长。我们应该坚持科技发展的初衷，不断追求真实和进步，拒绝走捷径的诱惑。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真正发挥科技的力量，推动人类社会的进步和发展，为创造一个更加美好的未来而努力奋斗。

民盟天津市委调研提出：

加快推进京津冀智能车联网协同发展

本报记者 张原 李宁馨

“在京津冀协同发展国家战略的大背景下，加快推进三地间大规模场景互用、开展多层次协同合作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日前，民盟天津市委深入调研，提出加快推进京津冀智能车联网协同发展的建议。

调研发现，京津冀三地充分发挥各自优势，在智能车联网领域超前布局、持续发力，取得显著成效。但发展差距相对较大，政策标准尚未对齐、协调机制有待完善等问题依然存在。

“京津冀区域内产业分工结构有待优化，北京具有全国乃至全球领先的科技创新优势，天津虽工业体系完备但带动作用不强，河北省产业结构依然偏重。与北京相比，津冀两地在智能网联、人工智能、核心算法等领域的头部企业和领军人才尚未集聚，在智能车联网领域，高校、研究机构等创新资源较

少。”在调研组成员、民盟天津市委常委会常委田强看来，北京市依托智能网联汽车政策先行区优势积极创新政策标准体系，但天津市、河北省政策法规创新有限，智能车联网产业整体发展框架不明显，产业发展不够协调，产业培育、技术创新、招商引资、人才集聚等方面配套政策有待完善。同时，三地智能车联网产业尚未形成协同一致、分工合作机制，区域间合作制度不明确，在政策标准的互认互通、联合开展重大科技创新、共建创新载体等方面缺少相应的配套措施，条块分割、资源分散的状况尚未得到根本改善。

调研组提出，要加强顶层设计，打造“一体化”示范工程，由工信部门牵头，组建京津冀智能网联汽车产业协同发展联合工作办公室。建立定期会商机制，开展车路

云一体化架构设计、系统设计、场景规划、系统集成、系统测评、商业运营等研究，形成一整套智能网联汽车与城市交通融合建设的技术方案，对京津冀地区进行开放道路、示范场景可行性评估，建立示范效果评估体系，打造首个跨省市级车路云一体化示范工程。

如何统一标准规范，实现车辆适配互认？民盟天津市委认为，要形成京津冀三地一致的建设标准与技术规范，构建技术路线一致、架构接口统一、政策标准联动、产业协同发展共同体，实现不同车辆在京津冀地区基础设施环境的快速适配和应用。开展智能网联汽车测试结果、测试牌照、测试里程互认，共同向有关部门申报京津冀一体化测试示范项目。

在共同搭建环境，完善配套服务平台方面，调研组建议，三地共同开放测试道路，实现跨地区的道路联

通。总结北京亦庄在智能网联产业基础设施运营、产业生态环境培育、综合服务平台搭建领域的成功经验，设立天津、河北数字化运营服务机构并面向两地智能车联网企业提供运营服务。推动京津冀智能网联云控平台、高性能计算平台与应用平台数据互通，数据资源及数据治理体系共享，共同探索建立智能车联网数据特区。

“要叠加技术优势，共建产业发展生态。”调研组提出，由科技部门牵头，发挥北京在技术创新供给、天津在高端制造，河北在应用场景示范的优势，针对高端传感器、计算芯片、操作系统、线控底盘、工业软件等领域，联合设立重大课题，开展核心技术研发与产业转化攻关，共建数字化研发支撑平台，打通智能车联网的技术创新全链条，共同发起成立智能车联网产业联盟，共同绘制京津冀地区智能网联汽车产业图谱。